

中共广州党史资料丛书

广州大革命时期
回忆录选编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共广州党史资料丛书

广州大革命时期 回忆录选编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叶创昌

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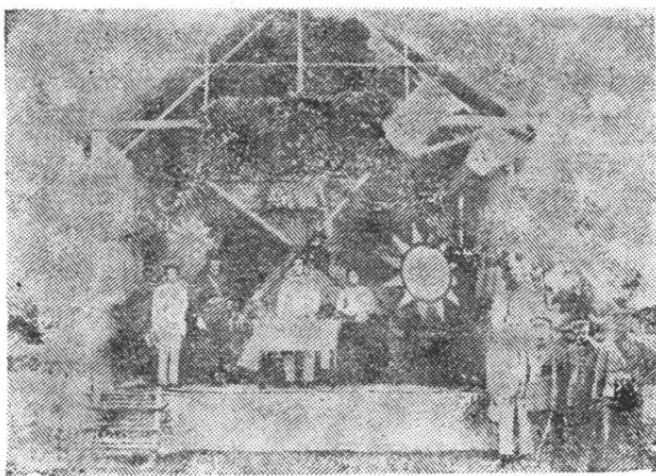
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张 387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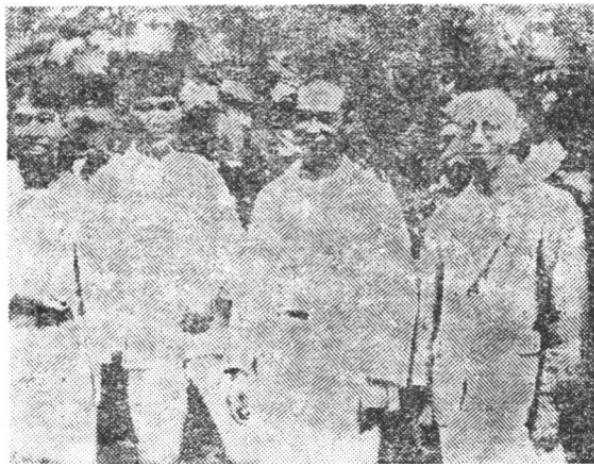
1986年12月 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11111·217 定价 2.75元



黄埔军校开学时孙中山在主席台检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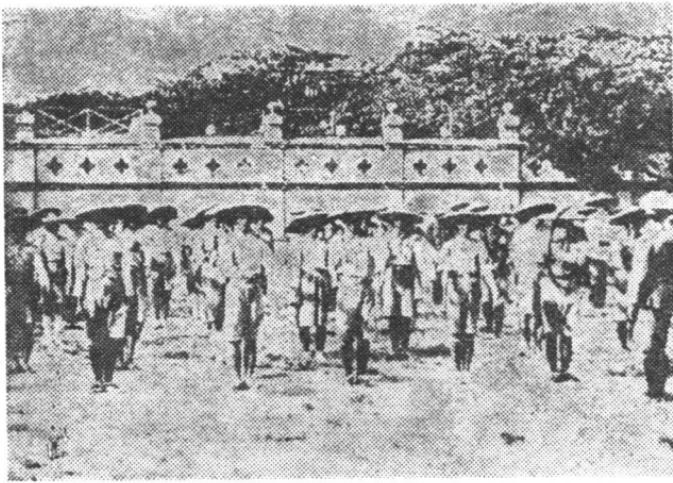


陈延年（右二）、刘尔崧（左二）、杨匏安（右一）、
冯菊坡（左一）在省港罢工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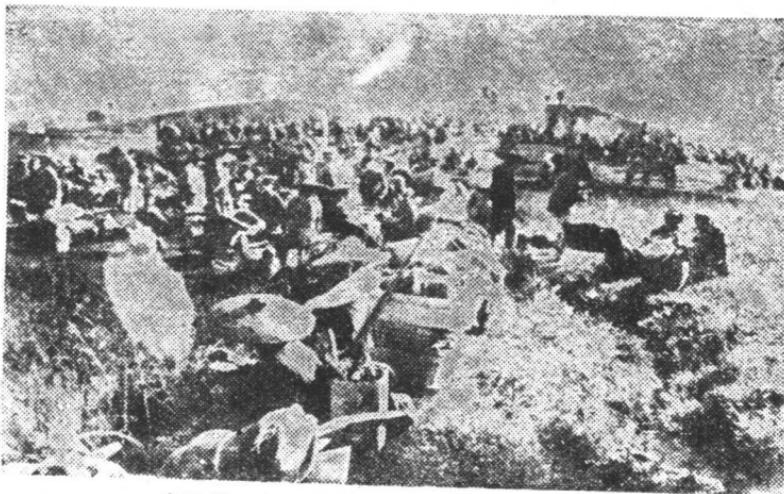


因为游行中的工人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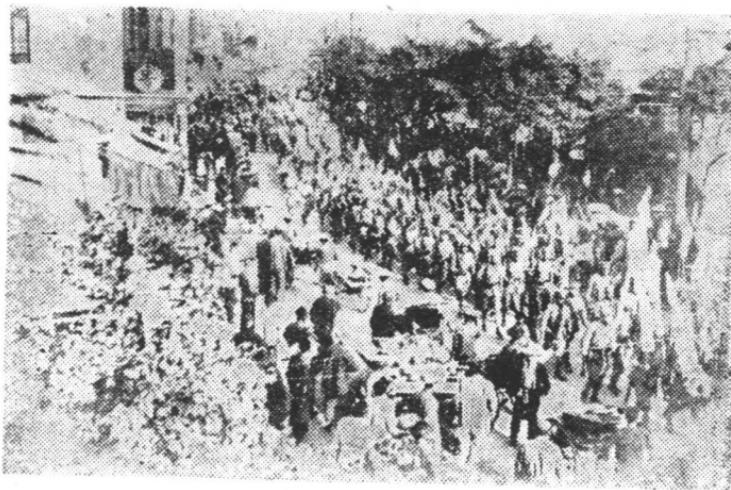
1926年6月23日反帝示威游行中的广州工人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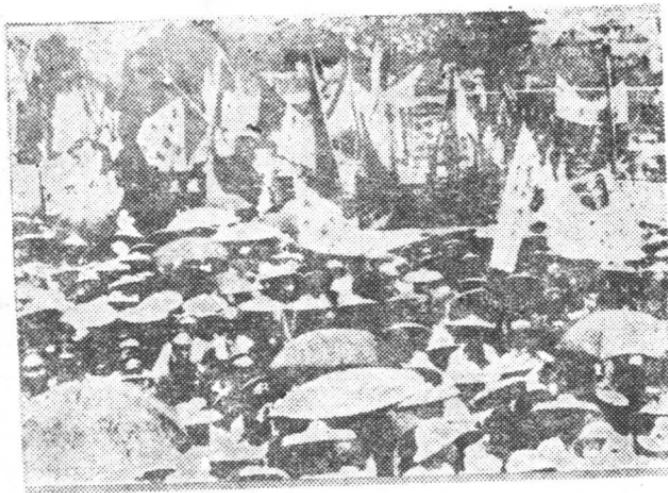
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在广州东园作军事操练



省港罢工纠察队组织运输队支援东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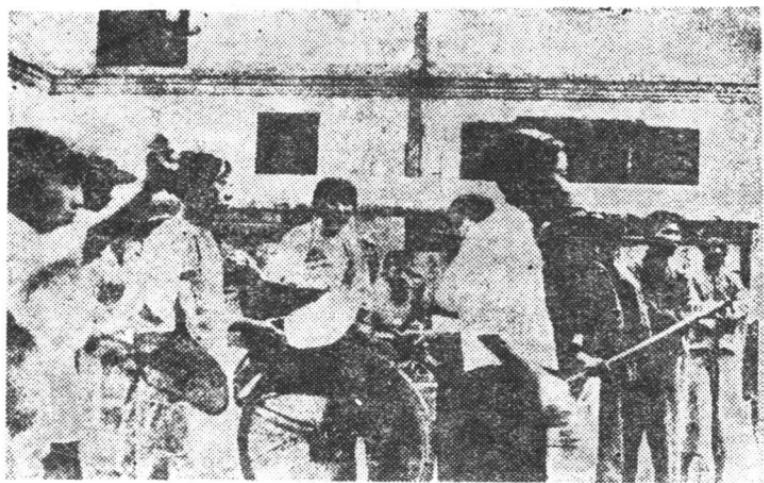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北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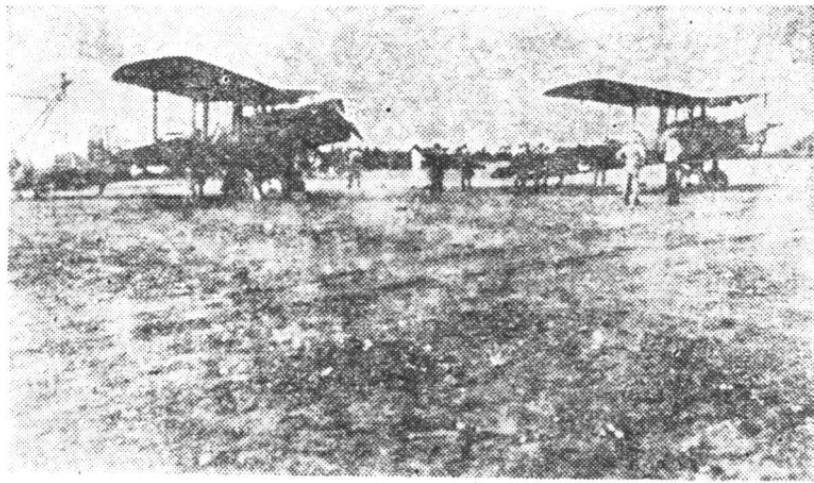
广东各界人民在广东大学欢送北伐军



参加北伐战争的广东农民自卫军



广州学生募捐慰劳北伐军



苏联志愿人员参加北伐

出版说明

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和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革命统一战线，促进了广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燃起了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帮助下，广州革命政府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队，镇压商团叛乱，平定杨、刘反叛，进行东征、南讨，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革命的暴风骤雨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加紧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了革命，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却一再向蒋介石妥协、退让，终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惨痛的教训。

广州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源地。研究广州这一阶段的历史，对于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把这一时期所能收集到的当事人的一部分回忆录，加以整理，选编出版。

为了便于研究和查考，所收录的资料一律保持原貌，对篇幅过长的资料则节录选登。原件的注释在每篇页下按①、②、③编次标明，编者所加注释，则按①、②、③编次，以与原注相区别。资料原标题作了改动的，则以符号“*”表示，并在页下加以说明。

本书由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纂，参加选编工作的有林镜华、黄穗生等同志。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胡提春、陈登贵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以及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支持，谨此致谢。

鉴于水平及资料有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录

- 毛泽东谈国民革命 斯 诺 (1)
关于广东党组织历史情况的回忆 包惠僧 (9)
在广东大革命的洪流中 赖先声 (玉润) (20)
大革命时期广东共产党的回忆 谭天度 (99)
回忆大革命时期在广州的革命活动 罗 明 (121)
-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党改组 包惠僧 (134)
中共“三大”会址及大会经过 徐梅坤 (157)
关于中共“三大”的回忆 梁复然 (167)
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宋庆龄 (169)
- 大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陈志文 (181)
大革命时期广东工运情况的回忆 罗大明等 (205)
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 刘达潮 (240)
广州沙面洋务工人的组织及罢工经过 梁国志 (251)
回忆省港大罢工 黄 平 (262)
关于广东农民运动和农讲所的回忆 肖一平 (269)
回忆第五届广州农讲所 黎赤夫 (281)
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运动 陈志文 (289)
大革命时期的回忆 区梦觉 (320)
回忆中共党组织在黄埔军校的
 活动情况 饶来杰 (竞群) (338)
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 宋希濂 (347)

北伐前的几件事	周士第	(388)
回忆北伐战争	胡允恭	(393)
北伐纪实	肖劲光	(416)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亚·伊·切列潘诺夫	(435)
关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		
国民党的关系	周恩来	(484)
回忆廖仲恺被刺前后	何香凝	(497)
关于国民党“二大”	吴玉章	(505)
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	李之龙	(510)
中山舰事件纪实	胡允恭	(528)
整理党务案	张国焘	(547)
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		
的回忆	陈果夫	(552)
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	黄绍竑	(566)

毛泽东谈国民革命*

斯 诺

一个晚上，毛泽东继续他的叙述：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长），许白昊和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

* 标题是编者加的。

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展开了蓬勃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

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

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

主持下召开。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